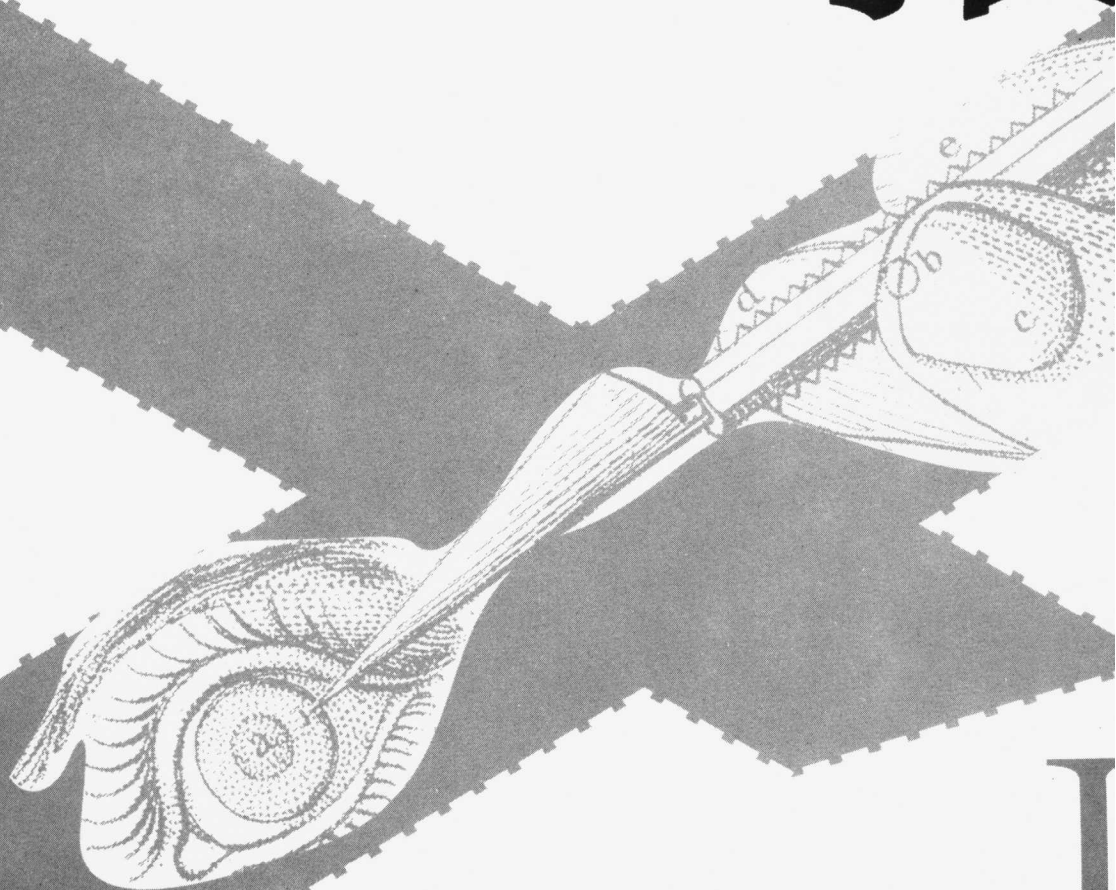


媒体警报



[2001/8/16-2004/11/25]

王泽剽窃《老夫子》长达四十年

“王泽剽窃朋弟的《老夫子》肯定是当前国内文坛最大的一桩剽窃案”，在自己的新书《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发行座谈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小说家冯骥才说。

为什么说是最大的文坛剽窃案呢？冯骥才解释，第一数量最大，据香港一家漫画杂志统计，王泽的《老夫子》发行量已达 1.8 亿册；第二流传最广，王泽的《老夫子》曾被改编成卡通电影《七彩老夫子》，去年徐克还根据王泽的《老夫子》投拍高科技版电影《老夫子》；第三，欺世盗名时间最长，从 1962 年王泽开始发表《老夫子》至今已近 40 年。

南有张乐平、叶浅予，北有朋弟

朋弟原名冯棣，祖籍北京通县，出生于四川成都，青年时期在上海学习美术 相继做过教师、编辑等。1935 年至 1937 年创作了第一个连续漫画人物“马方人”；1937 年至 1943 年创作的漫画人物“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等在京津一带的报刊上大量刊登；1957 年朋弟发表了最后的漫画作品《老白薯出土》，1983 年去世。

据朋弟的女弟子萧英华介绍，抗战期间曾为美术编辑的朋弟从北平迁到天津，用冯棣的谐音朋弟作笔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漫画界，如果说在南方、在上海，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张乐平的“三毛”和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那么在北方、京津一带首屈一指的人物则是朋弟先生的“老夫子”和“老白薯”。

为什么要替朋弟打抱不平

尽管同是姓冯 但冯骥才对记者说和朋弟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为什么要替他打抱不平呢？冯骥才说朋弟是他年轻时代的英雄，1996 年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发现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得知“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作者已经不是朋弟而是王泽！

“出于打抱不平、行侠仗义，加上自己比较熟悉天津，这件事我就揽上了。”冯骥才说。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抢救、挖掘一个被湮没的艺术家的意思”，他解释。著名漫画家丁聪看了他收集的朋弟的作品之后称赞说“真好”因此 冯骥才觉得“就像抢救天津老街一样，有责任把朋弟抢救、挖掘出来”。

为什么说王泽剽窃朋弟的作品？

据冯骥才先生介绍，王泽原名王家植，上世纪 50 年代在天津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 年代到香港。“王泽是他儿子的名字”。

冯骥才透露，在 1997 年至 1998 年间，他曾在天津大树画馆接待过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当时的王泽 70 岁左右，冯骥才问他“您是干什么的？”他的儿子介绍说：“他就是画《老夫子》的王泽。”冯骥才接着又问：“您认识朋弟吗？”王泽顿了一下，说：“很熟，很熟。”冯骥才说：“听到他矢口否认剽窃一事，心里实在气愤。只是当时气氛已经很紧张，我就转到别的话题去了。”

冯骥才说：“我们目前还没能和朋弟的后人取得联系，诉诸法律只能是他的家属来做。朋弟的作品还没过版权保护期，我相信官司应该能赢。如果需要，我肯定会支持。”

（刘江华 2001/8/16 北京青年报）

问题博导

隆冬里突然出现了响雷，因为有孕育它的环境，它在学术界炸响，是必然和迟早的事。

2002 年 1 月 10 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在第 7 版“学术争鸣”上刊登了《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文章直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引经据典，言辞凿凿，署名“晓声”。

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竟然出在以学风严谨著名的北京大学，已然成为社会的一种不正之风。对此的批评和讨论是否还应局限在学术圈内？学术圈内一些人为什么那么害怕媒体介入？

有人说生怕炒作，《社会科学报》就是在炒作，它真的在充当这样的角色？

和“晓声”同时刊登的还有一篇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的评论，早先曹与王铭铭有过学术论争，这起事件完全是曹的一个阴谋？面对众多疑问，本刊力求找到“当事者”以冀获得答案和真相。

不管怎样，对于颇有些名望的王铭铭前辈（尽管他还不到 40 岁）来说，“晓声”真的只能算一个“小生”，但就是这样一个“小生”曝光了这一最令人厌恶的学术腐败事件。

2002 年 1 月 17 日，本刊找到了这位真名叫“王晓生”的博士研究生，并且他愿意就此公布他的身份：首都师范大学 2000 级博士研究生，“走到这一步，已经不需要再隐瞒什么了。”王晓生原本就是该校的中文系硕士研究生，2001 年直升博士研究生。

2001 年的暑假，也就是王晓生直升之后，他开始翻阅王铭铭 1998 年所著的《想象的异邦》，但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王晓生随即查阅了美国人

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中译本)果然发现王铭铭抄袭多达 1/3 (《当》32 万字,《想》也有 30 万字左右,但有近 10 万字是“运用各种手段”抄的)。8 月上旬,王晓生开始仔细核对和校验,9 月底整理成文,然后发给了上海的《社会科学报》(至于在北京读书的王晓生为什么将稿子寄给该报社,以及他所经历此事的前前后后,后面的《无畏·晓声》中对此进行了详尽披露)。有媒体报道说,“王晓生本来只想弄成一个学术争论的,他个人对给王铭铭教授带来不便和伤害表示歉意。”但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王晓生明确表态,这其实不是学术争论,因为这涉及到学术态度和学术规范,他的本意就是要让王铭铭的学术腐败问题彻底曝光,他致歉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有不实之处,仅仅是因为对王铭铭造成的必然打击和可能的伤害。

《社会科学报》涉嫌炒作

从 2001 年 9 月底文章寄到《社会科学报》到 2002 年 1 月 10 日发表,其中有 3 个多月的时间,《社会科学报》为什么要搁置那么久?他们在等待什么?在核对和调查?果真如此,对待这样一篇投稿,他们花了多少代价?值得吗?本刊带着疑团和《社会科学报》的社长许明和着手调查工作的记者叶军取得了联系。

但是他们出言之谨慎超出了记者的预料,就好像当初对待这篇报道一样。本刊采访许明社长时,他说已经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因为他本人并不想卷入这一事件中去,“网上流言四起,说这篇报道是政府行为,是利用媒体来整知识分子,整王铭铭就像当初整胡风一样,那纯粹是胡扯!这种流言、这起事件都无疑暴露出学术界、科研和高校体制上存在严重问题!”

而在叶军处,本刊了解到一些细节,2001 年 9 月底王晓生寄来的文章最早是交到社长许明手中的,因为涉及到的王铭铭是一位知名的教授,而文章看起来又理正辞严,许明对此非常慎重,派了两名记者进行核对和调查,其中一名就是叶军。《社会科学报》开始进入了“要求王晓生核实”和“向北京、上海等地的国内知名学者请教”的过程。

“《社会科学报》是一份学术界的报刊(周报)我们报道这起事件的初衷就是希望学术界重新建立起一种严谨的学术规范，所以我们自己的调查也必须严谨。时间上我们等得起。”尽管本刊不断地在追问《社》报究竟请教了多少专家，但叶军始终不肯透露。

《社》报承认，他们原先就估计到报道一出，肯定会有如今的反响，但没料到学术界竟然仍有人将正规的学术规范批评纳入到人际关系中，并加以政治解析。然而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这篇报道有不实之言！

这正是学术界的浮躁！

整个事件是曹树基的阴谋

在《社会科学报》发表王晓生文章的那期上，还有一篇署名曹树基的《从王铭铭抄袭一事谈建立学术道歉制度》。这位复旦大学知名教授早在1998年12月13日的《文汇报》和1999年第一期的权威学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就发表过评论，对王铭铭一些著作中存在的常识性错误进行了列举并分析之后，指出，“人类学家切忌毫无根据地信口开河。……作者（王铭铭）本不应该犯下如此大量的常识性错误，他对中国社会的陌生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的失误可以为浮躁学风的追随者敲响警钟。”随即王铭铭与曹树基在媒体上进行学术论争，结果，王铭铭继续出版学术论著，继而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继而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

这次曹树基教授发表文章，王铭铭尚未作答。在面对媒体时，王铭铭不想表态。只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想，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说话的。”本刊在2002年1月17日晚屡次致电王教授，但是家中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2002年1月14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王铭铭做出处理决定，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学术职务基本被撤销。

基于早先两人有过学术论争，而现在曹树基又在这时刻发表不利

于王铭铭的文章，一些“品头论足者”认为，这起事件完全是曹的一个阴谋。本刊就此采访了曹树基教授。

曹树基所认为的学术腐败有三种：抄袭、拼凑和胡诌，他说他以前针对王铭铭发表的学术批评都只是说王在胡诌，从来没有“剽窃”或“抄袭”的字眼，尽管自己凭直觉曾经怀疑过，但曹树基仅仅认为这里面有“猫腻”而已。2001年12月底，《社会科学报》出于慎重起见，请曹树基参与核实晓声的文章，曹立刻进行了案头工作，3天后结论是：“晓声”文中所指确凿无误。然而，针对“搞垮王铭铭这是自己的阴谋”一说，曹树基教授希望借助本刊，发表声明——王铭铭在《想象的异邦》的《前言》中写得很明白：“本书不代表一个很成熟的看法，……对于学术发展而言，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成熟。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系统化的教科书，虽然写得面面俱到，框架醒目，却容易失去思考的价值，有的甚至约束了读者的解读权。”显然王铭铭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学术著作，而不是一本入门性、普及性的教材，所以它不再是原来教材意义上《当代人类学》的再版。对于这种学术上的“抄袭”，王晓生站出来给予了揭露，但是他还只是个学生，因为种种顾虑，他只能以一个化名“晓声”来发表文章。但是《社会科学报》需要有一个人发表署名文章，而他们选择了我进行核实并配发相关评论，我责无旁贷。

然而，有些网友认为这些例子似乎不足以说明王铭铭抄袭的全部，他们要求提供更多的细节。2002年1月13日“学术批评网”再次发表李一夫的署名文章：《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哈维兰著作的再举例》，列举了120—124页的各大抄处，并指出第8章《巫术、宗教与仪式》第143—162页也全部是抄哈维兰的；《想象的异邦》第二编《视野》第七章《跨文化视野中的政治》共分五个小节。五个小节中的将近四个小节抄袭自哈维兰……王铭铭不仅抄哈维兰的正文，而且抄哈维兰的脚注！文章是这样结束的“各位网友，请原谅我，我不能再逐段逐段地抄写下去了，我还有别的活要干。……晓声的揭发没有错，我可以作证。”抄袭，没完没了。

“一双绣花鞋”遭遇“一只绣花鞋”

论争焦点：“一双”、“一只”两年纠纷

1. 北京爆炒《一只绣花鞋》

2000年9月被标榜为“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先驱”的《一只绣花鞋》出版，作者张宝瑞被称为是“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诗人汪国真在该书序中写道：“知名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文学《一只绣花鞋》终于问世了。这一流传了数十年的手抄本历经风风雨雨，就像一株异草展示在世人面前。”汪序还说：“在‘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和手抄本就是《一只绣花鞋》——‘文革’后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

当年北京各媒体都大篇幅宣传《一只绣花鞋》。《北京青年报》登出《我想多找几双绣花鞋》的报道说，“文革”期间的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其魅力历经30年不减。如今原作者张宝瑞已将它正式出版。张宝瑞先后写了20多本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2. 《一只绣花鞋》源自《梅花党》

然而沉默了近30年的《一双绣花鞋》作者况浩文向媒体透露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是剽窃之作。2000年11月30日，《重庆晨报》报道：“前天，《一只绣花鞋》的作者张宝瑞在电话中向我市作家况浩文作了解释，并对个别的失礼失实之处向况老道歉，并称将在再版时更改书名。”张对记者说，书前面的那个序言中“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话，确系失实之言，是出版商在出书时擅自加上去的，他跟汪国真都不知道。至于书名，他则不承认是侵权。他说，《一只绣花鞋》是根据他在“文

革”中写的手抄本《梅花党》的故事改编的，后者其中一个情节就叫“一只绣花鞋”，现在书商把它提出来作书名，也无不可。既然况老有意见，我已决定再版时把它改名为《绿色的尸体》。

《一双绣花鞋》于今年7月，在故事发生地重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当初，《一双绣花鞋》的策划人白士弘与张宝瑞达成4点协议：《一只绣花鞋》停止出版和加印，今后要出版必须更改书名；汪国真写的那篇牛头不对马嘴的序必须撤掉汪国真同意将《一只绣花鞋》收入白士弘策划的《“文革”手抄本经典文库》重新出版，前面必须加上况浩文写的该书的创作经过；曾以大半版面报道过《一只绣花鞋》的《北京青年报》必须以同样的版面介绍《一双绣花鞋》及其作者 澄清事实 说明真相 消除影响 以正视听。

3. 重庆捍卫《一双绣花鞋》

重庆文学界对《一双》与《一只》的评论持续了两年。

最近一期出版的《红岩》杂志认为，《一双绣花鞋》在重庆百姓中可谓家喻户晓，而张宝瑞的书名是在对读者进行误导。张宝瑞当年可能不知道传说的《一双绣花鞋》是谁写的，但他肯定知道这个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他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原创者，伪装成手抄本中一枝独秀者，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巧取豪夺。

随着报道的深入，记者们竟发现了重庆人的“绣花鞋”情结。近两年来手捧手抄本找到况浩文的热心人有60多位，他们都表示，如果况老先生要告上法庭，他们就愿意提供证据。今年6月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根据重庆《一双绣花鞋》改编的电影《雾都茫茫》，背景墙上打出的图片都是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的封面，引起重庆市民的强烈抗议，重庆某媒体甚至打出“捍卫《一双绣花鞋》”的口号。8月25日重庆卫视推出《一双绣花鞋》专题片再次把重庆人对这本“‘文革’第一手抄本”的回忆推向高潮。

当事人说法：“一只”有没有剽窃“一双”

1. 况浩文：“我因为《一双绣花鞋》进了牛棚”

虽然重庆市民为《一双绣花鞋》被“盗名”愤愤不平，原作者72岁的况

浩文反而显得很平静。在电话中他跟记者谈的更多的是“那天晚上看到绣花鞋时的心跳”。

记者（下称记）：《一双绣花鞋》讲的是抓特务的故事，您当时也是公安人员？

况浩文（下称况）：这本小说就是取材于我从事公安工作的经历。我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了5年，1958年创作了中篇小说《在茫茫的夜色背后》。1964年初，珠江电影制片厂找我把小说改成电影文学剧本初稿，但因为很快遇到“文革”，电影没有拍成。小说、电影剧本却通过70份打印稿变成手抄本到处流传。我妹妹在黑龙江插队，听到当时有许多人讲这个故事，就给我写信说：“绣花鞋”穿到北大荒来了。1980年我那个搁置了16年的电影剧本终于拍成了电影《雾都茫茫》。

记：有趣的是电影和小说的名字反而不如《一双绣花鞋》给大家的印象深。你经历过这种恐怖的场景吗？

况：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重庆展开了“3·13”逮捕行动。当时是凌晨四五点钟，我用手电筒照明，对一个女特务的住处例行搜查，突然看到穿衣镜下面有一双黑底白花的绸缎绣花鞋。我持枪扑向柜子后面，见到除了一双绣花鞋，别的什么也没有。这个场景给我感觉太强烈了，后来我就把它移植到小说和电影中。

记：当时广州有部很出名的反特务电影《羊城暗哨》，它与《一双绣花鞋》有关吗？

况：《一双绣花鞋》的主人公沈兰有一个原型就在广州。他叫林念祖，解放前是地下党，做过美军的翻译官，后来在广东省公安厅侦查处任处长。1964年我到广州珠影修改剧本，林念祖先生还从一个老侦查工作者的角度给剧本提了一些意见，提得太内行了！

记：听说您还因为《一双绣花鞋》进了牛棚？

况：因为在重庆大家都知道《一双绣花鞋》，“文革”期间影响太大了，当时批斗《一双绣花鞋》的大字报贴满了四层楼高。1966年到1973年，我因为这部小说被关了8年牛棚。我被关进牛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

记：文革后《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变成正式出版物曾经引起很大轰

动，你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出版《一双绣花鞋》？

况 当时还有点私心，觉得才 3 万字的稿子太薄了，拿不出手，打算写了新的小说再合集一起出版。

记：您自己对 1958 年这件作品打多少分？

况：合格。当时全国文化饥渴，这篇小说才能流传那么远。

记：前年张宝瑞曾经许诺，再版时会改换书名，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出版的《一只绣花鞋绘画本》还是用了原名。

况：他在电话里头讲了会改换书名，可履不履行承诺是他的事情，我已经 70 多岁了，再也耗不起时间了。

2. 张宝瑞“一双”与“一只”是两个概念

记者未能联系到《一只绣花鞋》的作者张宝瑞，以下是《新闻晨报》记者对张的采访——

这根本就是两个故事，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一只绣花鞋》的创作是我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虚构而成，绝对是我的原创。为什么会不约而同都以绣花鞋为道具呢？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巧合。而这种巧合是很多的，不存在侵权问题。“一双”与“一只”是两个概念。

旁观者回应

1. “一只”与“一双”实质是一样的

重庆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华律师：30 年的时间已经模糊了大家的记忆。如果不是原作者，谁会仔细区分“一只”和“一双”？小说里还用了“文革”中大家熟悉的“绿色尸体”“梅花党”等故事，为什么偏偏选择“绣花鞋”来作书名？《一只绣花鞋》事实上是采取不正当竞争的作法来误导读者，企图把读者引向对女特务“绣花鞋”的熟悉回忆，从而达到商业目的。

2. 这种做法不符合民间文学传统

中山大学民间文学专业讲师施爱东：有一天我讲《一双绣花鞋》，把同学吓晕了两个，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有讲故事的才能。后来我就到处找

“反特”的手抄本抄完了之后给同学讲。有时实在找不到手抄本，就自己根据听到的一点点东西编，甚至于把原来的故事改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个“绿色尸体”的意象。那几年手抄本培养了多少讲故事高手！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从来没有这么热烈过，几乎每个人都能创造出自己版本的手抄本故事。但是如果把民间文学范畴的加工再创作说成是自己的创作，并且还是用了况浩文首创的意象“绣花鞋”，张宝瑞的这种做法就不大符合民间文学传统了。

3. 绣花鞋意象本身就是一个商标

民营书店老板杨先生从《一只绣花鞋》近两年的有关报道中可以判断，大多数读者还是把“一只”当作“一双”的。书名有没有冠名权？“绣花鞋”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一个商标，《一只绣花鞋》书中多次用到这个意象，书名又用“只”和“双”来混淆视听，已经损害了原作者的权利。虽然著作权法和商标法都无法束缚这种行为，但是这种行为至少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吧？

4. “一双”、“一只”是两种不同文学形式

记者观察：根据最新颁布的《著作权法》，有关侵权的判定是文字相同达到 500 字以上、故事情节相同超过 30% 以上，涉嫌构成侵权。《一双》与《一只》不在此例。第一，这是两种不同内容的作品，前者写重庆解放前反特务的故事，后者写梅花党的系列故事。第二，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一双》是 2 万多字的电影剧本，《一只》是 20 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三，两者名字也不尽相同。

回忆“绣花鞋”

1. 童年跑过春森路

《重庆晨报》记者马拉：有十来年吧，我们重庆人乘凉或摆龙门阵，都会讲讲这个绣花鞋的故事。它太真实了！我的童年都处在它的神秘恐怖氛围中。那时候我住在春森路附近，每次路过 26 号那个小洋楼“静庐”，都会拼命跑，生怕从里面会出来一个穿着绣花鞋的女特务！

2. “看了绣花鞋没？”

1970 年代末，国内许多剧团纷纷改编《一双绣花鞋》上演。1978 年底广东话剧团和广州市话剧团同时推出《一双绣花鞋》，两帮人马以“绣花鞋”打擂台，好不热闹。据当时广东话剧团反二号林福强的扮演者王文治回忆，这种反特侦破的话剧当时很受欢迎，特别是年轻人，有的买票进场看了好几场。有那么 3 个月，广州人见面就问：“看了绣花鞋没？”

珠江电影制片厂 1979 年征求领导对《一双绣花鞋》的意见，当时广东省委常委、省安全局长王宁同志的批复是：“我觉得这个剧本不错，很紧张，很吸引人。反特的电影，群众是喜欢的。我的小孩子对这个剧本就很感兴趣。他们说‘文革’中还流传过这个故事。”

3.“文革”手抄本广州找不着

李穗梅副馆长 广州博物馆有几百枚毛主席像章，有“文革”期间的票证、工艺品上千件，就是没有一本“文革”手抄本。因为“文革”一结束，大家都想尽快告别那个可怕的时代，转眼几年间，与“文革”有关的东西都被当作垃圾处理掉了。广州这 20 几年现代化速度更快了，普通人家都搬了三四次家，本来就当作业余生活调剂品的手抄本，在搬家的时候大部分都处理了。“文革”时期的手抄本以独特的形式反映了特定的年代，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我还记得当时大家较着劲在自己的手抄本上画满了插图和剪贴的报纸印花，1978 年以后，漂亮的印刷品一出来，手抄本就再也没人抄了，因为“太土了”。

注：何谓“手抄本”

手抄本主要在“文革”期间流行，时间大约在 1970-1976 年。据统计，流传有 300 多种手抄本，有名的起码有二三十种。它是“文革”这段特殊历史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一传十、十传百，因用手抄录而得名。当年手抄本都不署作者的姓名，再加上随着传抄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所以现在谁是手抄本的作者很难鉴定。

◎余杰：在基督耶稣降临人间的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人类是否过得更加幸福了呢

◎张育仁：我认为余杰的抄袭行为是铁板钉钉的事

说说余杰这个人^[话题]

◎张立国：袭余杰笔法，亦剥其皮，聊以解闷

◎高波：某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我心中却有数了

张育仁指控余杰剽窃其作

□话题发起人 金晋京

有“北大怪才”之称的余杰最近发表了一篇《余秋雨 你为何不忏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最近重庆作家张育仁指控这篇文章抄袭了他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一文，近日，笔者对张育仁进行了采访。

张育仁表示，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引用了他的文章的实质部分，如写这篇文章的主要依据——有关余秋雨文革中的表现的“罪状”，除了有关余秋雨写《胡适传》一事引用他人作品外其他都引用张育仁的文章。张育仁还指出，余杰在引用过程中，并没有注明文章的出处，而使用了非常巧妙非常聪明的做法，只在文章中引用了张育仁一句话时注明出处，且加上一句：“我与张育仁 应为张育仁 余杰原文如此——笔者 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张育仁的文章发表在 1999 年 10 月号《四川文学》上。

余杰态度又怎么样呢？不久前余杰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说：“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很早，我大概在半年以前就写了。但完成之后，投到几家报纸都不敢发，所以这次就收到自己的新书里，作为一篇重头文章。而且因为目前这些材料是第一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言论是板上钉钉。”

对此张育仁说，余杰是不诚实的。原因如下——

1. 余杰在文章里表明，他写这些文章对张育仁《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重要缺环》一文引用表明，他在写这篇文章前看过张育仁的文章。2. 作为四川人的余杰，与《四川文学》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得以使余杰以最快的速度看到《四川文学》。3. 在余秋雨的主要“罪状”中除了有关《胡适传》的内容之外，均引用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重要缺环》。4. 余杰不看张育仁的文章，根本无法形成《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因为其中基本材料都是张育仁的。当然，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进行了大量的发挥。5. 余杰的不诚实还表现在，他在文章的后面还遮遮掩掩地说他同意张育仁的观点。

笔者把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重要缺环》和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进行对照，可以看出两篇文章的结构和内容基本相同——

一、《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重要缺环》一文中《一、余秋雨研究何以苍白和尴尬》，主要观点为余秋雨拷问历史的同时缺乏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历史拷问和灵魂拷问》，同样表达了这一观点，从这个小标题也可以看出。作为主要论据，《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重要缺环》一文，张育仁三次引用学者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一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则同样引用了两次；余杰所引用的两次与张育仁引用的内容三次中的两次完全一样。文章在陈述上，给人感觉到其中的语气是一样的，甚至细节的说法都一样——张育仁写道：“当‘他更多地把笔指向对象世界’时，他确是‘下笔力透纸背’；可是，他却很少把笔毫不犹豫地指向自己。——余秋雨身为‘拷问者’的种种机巧而艺术的躲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我们对这个大名鼎鼎的‘拷问者’的‘资格’产生了怀疑。”余杰则写道：“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工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这样的相似在本部分中不少。

二、张育仁《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重要缺环》中《二、余秋雨何以要躲闪‘文革’的写作经历》和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文革”余孽》部分，主要指出余秋雨“文革”时参加《学习与批判》写作组的种种“罪状”，

并引用余秋雨《千年庭院》中的两段话，同样涉及到余秋雨的《三十年的重量》一文，还有对几个写作组的介绍。仔细阅读两篇文章的这部分，可以发现几乎是一样的。

三、《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中《三、余秋雨与 学习与批判 》部分与《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胡适传 个案分析〉及《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部分的对比。余杰的文章中称：“王东成先生说 他从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够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这一评介极为准确（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对比一下张育仁的文章，其中有同样的话——“王东成先生一针见血地说，他从秋雨散文中‘能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

从两篇文章的对照中，令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1. 张育仁和余杰的文章，观点基本相同，写作结构也大同小异。
2. 余杰的文章比张育仁写得晚，并且余杰写此文之前看过张育仁的文章。
3. 余杰和张育仁引用的大量的资料从很多细节上看都出奇地相同。
4. 余杰的文章比张育仁的尖锐，但余杰文章的说话口气居然有不少与张育仁非常像。

(2000/3/9 燕赵晚报)

相关链接 1

>>

闸门在你的肩上

在基督耶稣降临人间的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人类是否过得更加幸福了呢？人类能够上天入地，有计算机和原子弹，比起耶稣所生活的那个世纪的人们来，似乎强有力了千百倍。然而，就精神的意义来说，人类不仅没有获得拯救，反而滑入了更苦难的深渊。在真理晦暗不明的时刻，读到《信仰与重负》这本书，我仿佛看到黯淡的星空中有一颗亮晶晶的星辰在